

辩证唯物论昭示我们：人们不管主观上是否自觉，他们对于周围客观世界，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概念与观念。这一切的总和，就是人们对物质的社会存在作出各种反映的世界观。人们的世界观不仅反映了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态度，也表现于他们所能采取的种种行动。

语文教育观，便是人们如何看待语文教育及其内外相关因素与有机联系的一种特定世界观。

绪论 语文教育观与语文教学改革

学校语文教育活动作为规范而有创造性的教育行为，它的发生、发展、变革与演化，无不受制于一定的语文教育观。树立正确的语文教育观，不仅有助于确立积极、科学的语文教学态度，而且也有助于指导语文教学过程中任何环节的有效教学活动。所以，语文教育观既有认识论意义，也有方法论的效用。

为了顺乎社会客观需要和语文教育规律自身的发展，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就必须自觉地树立并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语文教育观，从而主动、积极地投入教学改革的一系列创造性活动。

一 本体观——对语文学科独具的特性 及其使命的本质的研究

学校教育主要是由各学科教育所组成的。“学科”之所以能卓然设置，其基点则必须是“科学”；学科性质的内涵和外延，应该有科学的界定；学科体系所关涉的概念、范畴及相关术语，应该能作出科学的阐释；学科内容的安排及其目标的达成，应该能预想并遵循科学的序列与步骤，等等。凡此种种，在学校教育的大多学科中，几乎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偏偏在语文学科，这一切却很难取得科学的回答。

令人遗憾的是，语文教育最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似乎谁都能对它发表一通意见，都可以直接插手作“具体的指导”，于是，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却反而变得越来越不认识“语文”了。

说到底，从政治因素看，影响我们对语文学科性质形成正确看法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左”的干扰；从思想方法论看，导致语文学科性质“二元论”乃至“多元论”的症结，则是忽视了对语文学科的“本体”作认真切实而深入的研究。

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固然有着广泛联系，然而，对语文教育的研究决不能总是在外围迂回。树立语文教育的本体观，日益加深对话语文学科独具的特性与使命的本质认识，这不能不说是对话语教育本身研究的首要问题。举凡语文学科性质的科学界定、语文学科体系的科学阐释、语文学科内容与学科目标的科学系列，都离不开以科学的语文教育本体观作为指导。

就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言，迄今仍有不少同志摆脱不了非本体研究倾向的干扰。固然，“语言是交流思想和社会交际的工具”，语文教育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和否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然而，在语文学科能不能明朗地称之为工具学科的观念上，明显地难以达成共识。说语文学科“思想性、工具性兼备”者有之；持反对所谓“纯工具性”见解者有之；以致一些颇有影响的语文教学法著作仍断言：语文学科从1920年正式列入中国中学教学计划到现在，已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可是，至今它的‘性质’还没有搞清楚”，“语文这门学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一个没有被认识的王国。”

“语文”，这门在中国普遍被列为第一位重要的基础学科，竟正如吕叔湘先生在1978年就指出的：“十年多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①毋庸讳言，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差的状况，迄今还没有全局性的改观；看来思维颇为活跃而踏上工作岗位的许多学生，他们却未能被培养出适应社会实际需要的较高语言文字水平。“语文过关难”的咏叹调，仍然在全社会长期传唱。

^① 吕叔湘：《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人民日报》1978年3月10日。

正像在科学昌明时代的人类，最不了解最缺乏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本身那样，语文教育也坠入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津。“语文”没能充分用以对“语”“文”的特定地位作确切表述。人们不禁要由此产生疑窦：这究竟是由于语文本身过于复杂、神秘而带来困惑，还是由于语文教育的发展在趋于异化呢？

语文学科这个“王国”难道无法被科学认识？语文教育的规律难道无法全面地被科学揭示？

语文课堂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实际语文水平，难道永远是无所作为，可有可无？

为了扫除横亘在语文教育科学化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就必须牢牢掌握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武器，廓清在语文教育诸多方面“不可知”的阵阵迷雾，让其再现峥嵘的真面目。

在中国，语文教育是千百年来数以亿计教者和学者参与的实践活动。尽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时期，语文教育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糟粕，然而，这样宏伟悠久举世无双的教育实践，客观上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的资源；并使相当一部分语文教育工作者据此奠定了语文教育唯物辩证观的基础。事实上，我们许多优秀的前辈学者在接受他们所处时代先进世界观影响后，也都曾批判地继承教育的历史遗产，对前面述及的一系列问题，清醒而明确地作出过经得起实践检验、又能正确指导实践的回答。吕叔湘先生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所作的“序”中对叶老的语文教育思想作出了高度评价，并旗帜鲜明地赞扬这本集子中大部分解放以前写的文章至今还没有过时。他指出：“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

然富有现实意义。”^①只要我们全面认真地研读叶老的著述，就不难发现，诸如“语文学科性质”、“语文名称涵义”、“语文课堂教学的目的功效与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叶老都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上作出割切的阐释与剖析。

我们如有可能再拓宽一点研究的视野，我们还可以发现，叶老的一系列语文教育观点，又都反映了他与同时代学者专家们的某些共识。就像叶至善先生所说的，叶老“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他跟朋友们一同做的，发表的许多主张，也大半是他和朋友们共同的想法。”^②前辈们孜孜以求的实践与研究给我们作出了楷模：只要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地探讨和总结，语文教育从现象到本质、从局部经验到全过程的规律都是可以逐步取得日益逼近真理的认识的。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有关语文教育目的任务等问题，在语文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多次开展过大讨论。不少有识之士曾各抒己见，阐发了一系列很有指导意义的基本观点与具体见解。如果这类讨论能循着学术研究的轨道得以健康进展，自然会有利于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尽快地树立正确的语文教育观，推动语文教育的实践。令人遗憾的是，语文教育最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似乎谁都能对它发表一通意见，都可以直接插手作“具体的指导”，于是，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却反而变得越来越不认识“语文”了。

说到底，从政治因素看，影响我们对语文学科性质形成正确看法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左”的干扰；从思想方法论看，导致

① 吕叔湘：《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后面出现此书，简称《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② 顾黄初、李杏保编：《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序”，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语文学科性质“二元论”乃至“多元论”的症结，则是忽视了对语文学科的“本体”作认真切实而深入的研究。

我们知道，叶老一生追求革命真理，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然而，他决不使这种重视超越相关的限度，决不把思想教育这种各学科的共性要求去取代语文学科的个性特征，他早年曾明确指出：“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旨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任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多余的”^①。我们要科学地研究语文学科独具的特性与使命，就应该具备如叶老这样鲜明的语文教育观和坚定的学术胆识。

二 整体观——对语文教育外部环境 相关领域及内在机制的系统观照

科学的语文教育观固然需要将语文学科教育作为主要对象进行本体研究，然而，这种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它需要把语文教育的外部环境、相关领域及内在机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从整体上系统地观照语文教育。这就是语文学科赖以指导整体改革的整体语文教育观。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教育都是受社会制度与生产力状况制约的。语文是社会交际生活中最重要的工具，因而，语文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尤为密切。

社会生活不可能不干预语文教育，语文教育也不可能不参与

^① 叶圣陶：《略读指导举隅·前言》，《选集》第19页。

如果说世界观的形成与完善，必须以积累人类所创造的文明知识为基础，那么，树立宏阔的大语文教育观，也就应该“走出”语文，还要把研究的视野拓宽到相关学科的广泛领域，采取系统论的观点，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伦理学、传播学、阐释学、管理学、科学学、历史学、未来学等各个角度，综合地考察研究语文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其科学途径。

社会生活。语文教育的价值最终要取得社会的承认，语文教育的功能最好要由社会来经常作出检验。我们在“本体观”中强调了对语文学科本身、对语文教育本质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对其外部环境等方面的系统观照，外部环境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我们不应该予以忽视和回避。

为了适应多方位、多层次的社会生活需要，语文教育内容和语文教育渠道就必须相应地向多维空间进行开拓。语文教学范畴原来被概括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字宪法”。今天，我们对这“八字宪法”的蕴涵和重点倾向，都应该有新的认识与理解。我们已不能再局限在烦琐的语法理论意义上去认识字、词、句、篇等语言现象，而要进一步从信息载体的功能上去掌握和提高字、词、句、篇四个层级语言文字的实际运用能力。至于“语、修、逻、文”四个要素的罗列，我们更应从语言和思维共同作用于认识社会的根本关系中去重视思考它们的应用价值和应用地位。语文教学中旨在将知识化为能力的“听、说、读、写”四大组成部分，显然，也都听命于社会的呼唤，正在不同程度地得到强化。充分调动一切感官综合有效地进行语文科学训练的体系，越来越受到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语文教育在加强其课堂教学这个主体阵地建设的同时，又将校内语文课外活动、校外语文社会活动开辟为语文教学第二渠道，主动加强学校语文环境、家庭语文环境和社会语文环境对语文教育的正面影响，努力消除这些环境对语文教育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使学生在无比广阔的语文天地中获得多方面的丰富滋养，和谐、健康、尽快地得以发展与成长。毫无疑问，这种“整体语文教育观”或“大语文教育观”的宏观思路，给原来囿于封闭状态的语文教育注入了强有力的生命剂。

如果说世界观的形成与完善，必须以积累人类所创造的文明知识为基础，那么，树立宏阔的大语文教育观，也就应该“走出”语文，还要把研究的视野拓宽到相关学科的广泛领域，采取系统论的观点，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伦理学、传播学、阐释学、管理学、科学学、历史学、未来学等各个角度，综合地考察研究语文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其科学途径。

这些学科推动语文教育进行哲学思考、社会参与、政治感应、经济运筹、文化探寻、心理调适……，并启迪语文教育从对某些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结合上，对其教学原则、教学价值、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作出深层的再认识或新思考。

从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实效考虑，语文教育应该明确目标，集中头绪，减轻辘重，轻装前进；同时，正是为了获取语文教育的高效益，作为语文教育的研究工作者包括富有经验而又锐意改革的广大语文教师，都需要努力地多学科观照系中去寻觅全面提高语文及相关智质与能力的运行轨迹，探求在语文教育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效应。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在研究工作中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都是片面的，都有悖于整体的语文教育观。在语文教育研究中进行多学科的渗透，决不意味着语文学科要被煮成不辨原来真面目的大杂烩、大锅汤，不是去要求学生腾出语文学的地盘，支离破碎地去集纳各种学科的某些概念和术语。

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类似精神食品的研究人员。食品研究人员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要去改变人们的主食品种，也不是要去全盘否定人们既有的饮食习惯，他们致力于生命科学、生物科学、生理学、食品学、药理学、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宏观地探讨各种事物结构与生命、健康的关系，精细地分析食物中所含各种维生

素、蛋白质、脂肪、糖、纤维素乃至各种微量元素对人体相应机制所起的作用，从而向人们建议如何合宜地选用各种有益成分的天然食品或人工合成食品。同样，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进行多学科的探讨，目的是为了从宏观上更好地服务于语文教育，而不是为了以多学科的渗透去取代语文教育。生命体的生命力固然附着于硕大的躯体内，然而，人们往往在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排泄系统中的一个细小环节上会发现影响到生命的症结所在。如是观之，宏观的语文教育又不能不顾及微观的语文教育，不能不精细地去研究与语文教育机制相关的一系列教育环节及其对立统一的关系。

比如，阅读与写作是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个范畴，但迄今仍有不少同志过于强调读写结合，似乎阅读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学习写作技巧，陷入了形式主义“读写结合”的误区。既挤走了精心指导学生阅读的时间与空间，又使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写作思路偏狭，“读”与“写”两败俱伤。

“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①，自叶老精辟地指出精读与略读这种不同的功能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校语文教育中，仍然是严重存在着忽视略读和略读指导的现象。就“阅读”这一语文教学范畴而言，需要微观研究的课题就有许多。至于“听”与“说”这两个过去长期被语文教育研究界打入另册的范畴，迄今在研究中空白的课题更是不少。诸如此类的微观研究，都是构成我们整体语文教育观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叶圣陶：《略读指导举隅》，《论集》第19页。

三 辩证观——对各种语文教育理论 教育思潮的多元思考

语文学科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在它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建设起反映科学规律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系列理论，是我们科学的语文教育观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的传统教育理论受儒学影响很深。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主张，无疑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教育的楷模和律条。《论语》中涉及的“言”、“文”与“德”、“行”一致的观点及许多教学经验的总结，诸如：启发式、以身作则、切磋琢磨、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都为传统语文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了基础。嗣后，思孟学派撰著的《学记》，是世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专著。其中，论及教师讲解语言的“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以看做是语文讲授法最早的理论准则；强调教学要有“善问”之术，“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及其它也，相说以解”，也可以看做是问答法与讲解法早期结合运用的理论表述；他如“藏息相辅”（“正业”与“居学”相结合）、“教学相长”、“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又莫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视为今天“大语文教育观”、“语文教学主体观”和“语文教学过程系统观”的理论先河。及至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朱熹、元代的程端礼、清代的唐彪等，也都为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理论遗产。作为儒家教育观的思想体系，基本上应归属为历史唯心主义。他们的语文教育目的观、语文教育功能观以及禁锢的语文闭门修养观和僵硬的语文灌注教育观中，不免带有许多陈腐的糟粕，必须予以坚决摒弃。但，正如前面所

庐列的历代儒家代表人物的语文教育观中，也有许多折射出某些朴素唯物主义光芒和辩证法光彩的传统文化珍宝。它是人类文化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宝贵的语文教育遗产。对它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也是不对的。

马克思曾毫不留情地批判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同时，又充满热忱地肯定并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对待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儒家语文教育观，我们难道不也可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予以批判继承吗？

长时期来，在日本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曾不断地掀起一阵阵新儒学热。他们根据本国的社会需要与教育需要，发掘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有利因素，并将其阐释成适应当前的新儒学形态，用以推动本国的国文教育和华文教育，据说也取得甚佳的教育效果和社会效果。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各自确立的语文教育观自然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儒学起源于中国，我们又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我们更有条件、更有理由合宜地扬弃儒家语文教育思想，建设合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现代中国语文教育观。

翻开近代语文教育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具有单独设立学科意义的语文教育，是从废科举、兴学堂和维新声浪中诞生的。几乎从那时开始，它就不断地受到西方各种教育思潮、学派和理论的影响，在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中，传统语文教育观一再受到挑战与冲击。西方教育的种种观点、概念与观念却不胫而走地一再闯入语文教育的实践与研究王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健步跨入了神圣的教育殿堂。语文教育王国开始纷纷扬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儿

童中心主义、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柏克赫斯持的道尔顿制，相继渗入中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中国一批语文名家和教育名家，诸如陶行知、舒新城、穆济波、孙俚工、廖世承等。西方资产阶级那些相对带有新鲜内容和时代进步倾向的教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他们，于是，乐此不疲地钻研、借鉴、实验，以至通过实践去检验和改造那些未必适用的理论体系，从而逐步形成适合我们民族实情的教育观。他们的历史经验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时隔半个世纪，中国面临了远比五四运动更深刻的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的大好时机。教育王国一度封闭的大门再次打开，国外各种语文思潮和教育思潮，直接由海外向我们迎面涌来。面临这外来的大潮，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如饥似渴地思索和抉择着。于是，从“现代语言学”取道者有之，向“思维科学”问津者有之，援“心理学”攀登者有之，入“美学”探奥者有之……。皮亚杰、乔姆斯基、布鲁纳、罗杰斯、斯金纳、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巴班斯基、卢扎洛夫、布鲁姆及他们代表性的教育主张，陆续地被请进中国语文教育界。曾几何时；发现法”、“结构主义”、“高难度原则”、“程序教学”、“最优化教学过程”、“暗示教学”、“目标教学”等，成了语文教育新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曾受过否定和批判的“学生中心主义”、“实验主义”、“设计教学法”等，又被“重新认识”，以至大加肯定和赞赏。尽管中国迄今仍未见有哪些语文教育的学者高举自己的大纛来召集足以形成有特色阵营的学术群体，但是，客观上在广泛的传播和交流中，却已确实开始在一定范围内自发地形成了持有如上某些观点的语文教育流派。

回顾这许多年来，语文学科一度成了吸收外来思潮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语文教育界提出的许多教育观点和口号在全国发生

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从总体上看，从社会的实践反响看，语文教育却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大、中学生语文水平低下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造成这种令人忧虑现象的外在原因固然很多；然而，在我们需要形成自己语文教育观的过程中，在借鉴西方教育思潮教育理论时，不少同志形而上学的倾向较为突出，辩证法的观点不够坚定，教学实践和教改实践中赶浪潮的热情有余，冷静分析则不足，以致带上了一定程度的盲从性和任意性，这些也都不能不说是导致失误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对待中国传统教育，还是西方现代教育，简单地肯定一切，或是否定一切都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认为，中国的传统比较强调知识积累的系统教授，而西方则强调思维发展的方法教育。他的结论是：“这两种教育方法确有很大区别，不能说哪个绝对的好，哪个绝对不好。”^①他还结合自己读书教学的实践深有体会地指出：中西教授的影响并无孰厚孰薄，“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②这确是冷静、严肃、辩证的科学态度，我们看待代语文教育理论也应作如是观。

四 发展观——语文学科的教改走向与 未来使命的纵深探讨

语文是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教育是继往开来的事业，语文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不可遏止！

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教育发展的总趋向作出了纲领性的指示：

杨振宁：《科学、教育与中国现代化》，第149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② 杨振宁：《科学、教育与中国现代化》，第149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①这“三个面向”从广袤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开拓了人们对教育的视野，也开阔了人们语文教学改革的思路。

语文教育原有的一系列语文教育观受到了检验和挑战！

面对 21 世纪，现代人所需要的语言能力结构有了新的发展。语文人才的概念有了新的时代要求，语文教育观也就相应地有了发展。

韩国著名学者崔昌烈教授在《国语教授法》“国语教育现代化探索”一章中，对现代人应具备的语文能力，提出了独具开阔思路的新见解：

1. 具有主体意识和丰富的个性，能掌握科学技术，驾驭现代化手段；

2. 不趋时人鹜而真正适应时代潮流；

3. 善于利用社会群体，能得到社会群体培植，并在社会群体中出类拔萃；

4. 具有高度的语言生成能力，在思考、行为和工作中能充分运用语言并善于迅速作出正确判断；

5. 能合理地、科学地进行思考，富有创造性和果敢精神。^②

从上述的高度去思考新一代所需要的语文能力，显然是预见到语文社会功能及其表现手段必然发展而规划的新培养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崔教授还根据系统论、生成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人本主义语言学的观点，构想了国语教育科学化、效益化、集体化、人性化等现代化的方法。

① 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 页，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崔昌烈：《国语教授法》，第 246 页，韩国开文社，1989 年增补再版（李杏保根据原版翻译）。

语文是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教育是继往开来的事业，语文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不可遏止！

面对 21 世纪，现代人所需要的语言能力结构有了新的发展。语文人才的概念有了新的时代要求，语文教育观也就相应地有了发展。